学术专论

进化之调律：斯宾塞与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

彭春凌

［摘要］ 斯宾塞学说构成清末种群进化和竞争论述的主要外在资源。斯宾塞以进化的哲学思维来缀合威廉·卡彭特、查尔斯·赖尔所代表的动物生理学和生物历史知识，回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中国译介和流行的正是卡彭特所代表的生理学著述片段或与其相似的种群差别认知。知识界对斯宾塞的翻译，意味着中国在戊戌时期发生了类似的理论缀合过程。清末知识人以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调整了斯宾塞的种群进化位阶表述，抵制欧洲人歧视东亚黄种之心。同时，他们却强化了贵贱种之间的等级关系，营造“退化”“灭种”的焦虑意识和压迫感，警告需积极参与生存竞争来提升种群的心智和自律性，从而为政治变革酝酿社会气氛。

[关键词] 斯宾塞　威廉·卡彭特　严复　章太炎　种群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2022）– 01 – 099 – 013

一、种群进化论与 1850 年代以降中英间的知识流通

甲午战后，朝野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必须直面黄白种争的世界形势。保种与保国、保教一起，成为强烈的民族心声。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固然建基于鸦片战后徐缓渗入的人种分类学说。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种争、保种论述的成型，几乎同步于严复、章太炎正面引介赫胥黎、斯宾塞进化学说的历程。[①] 种争论述中退化、灭种、竞存、天择、淘汰等等表述，亦显然渗透着种群进化学说的理论思维。种群进化的理论与种群竞争的论述，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状态。深有意味的是，如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种族竞争和保种论述的主要外来资源，不是达尔文主义，而是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和拉马克的线性模式。[②] 然而，迄今为止，尚缺乏关于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在中国如何落地，经过怎样的转化而

［收稿日期］ 2021–05–01
［作者简介］ 彭春凌（1981—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pengcl@cass.org.cn
［基金项目］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经费。

① 关于中国近代接受进化论思想的整体研究，可参见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②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1.

产生影响的切实研究。[①] 以致就进化论影响中国至深的领域——近代种群竞争论述，对其核心理论问题和历史脉络的认识，其实还相当模糊。

综合来看，清末知识界译介斯宾塞著述，潜伏着一条较全面勾勒斯氏生物、种群进化学说的线索。1898 年《昌言报》发表了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其中包括创作于 1857 年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以下简称《论进步》）。该文讨论宇宙天体、地球地质、生物种群、人类社会及诸文明表象的演进，归纳“进化”普遍的法则和原因，最能见种群进化在斯宾塞对进化整体构想中的位置。1896 年，严复着手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最旨》篇后他撰有长篇按语。大段文字翻译自斯宾塞 1867 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第 2 卷最终章《未来的人类种群》，严复称为“《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②] 这段体现《生物学原理》核心要义的文字，表现出斯宾塞将进化观念渗透到对生物学的认知。1903 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群学肄言》，原书即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该书《生物学上的准备》（严译为《宪生》）一章，被严复视为“真西学正法眼藏”。[③]《论进步》《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在处理“进化”与种群竞争的关系时，逻辑上各有侧重。它们被译介为汉语，同中国的思想世界发生勾连的过程，留下了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在中国落地转化的脚印。

调律，如今也叫“调音”，指拧紧或放松钢琴的琴弦，使之达到一定音高。《文心雕龙》谓“杜夔调律，音奏舒雅”。[④]“律”和“历”相称，自古以来就指向对自然规律的辨察、描摹。用“调律”来形容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在中国产生转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知识界调节了斯氏种群进化论述的音奏，使之谐和于中国种群竞争论述的需求。具体地讲，中国的译者将黄白人种同样置于“贵种”的层级，从而调整了斯宾塞置欧洲人为最上级的种群进化位次；同时他们也催化了“灭种”“退化”的焦虑意识。描述生物特征变异强调缓慢渐变的拉马克主义，诸如“用进废退”、适者生存等原理，转用于描述国际政治一般层面的富国强民、优胜劣败。以至于在中国，一种探究变化原理的理论，无形中充当了一个呼吁变革的时代之定盘星和加速器。

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的产生，在中国发生转化，影响清末种群竞争论述的过程，其实还潜藏着一张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英语与中文两个世界知识流通的网络。19 世纪以降，生物学特别是脑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的本性是由大脑的结构所决定，由遗传下来的智力或行为模式的局限性所决定，由进化进程的性质所决定”。[⑤] 斯宾塞 1851 年在生理学家威廉·卡彭特（William B. Carpenter）的著述中，阅读到胚胎学者冯·拜尔（Karl Ernst Ritter von Baer）关于胚胎成长过程的论述，即各种胚芽在组织和化学成分上最初都是均质的物质，在无止境的分化后，它们成长为拥有复杂组织和器官的动物与植物，建构了我们这个森罗万象的有机世界。这给予斯宾塞极大的启发，他将有机体进步所包含的“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变化”，推而广之界定为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进步法则。[⑥] 创作于 1857 年的《论进步》，主题即在于此。斯宾塞指出，大脑的发育程度，正是区分种群间进化程度的标志。虽然说“生物学”（biology）这个词在 18 世纪后期已经被使用，其含义指向针对从自然史区分出来的对生命展开的新研究，

---

① 中国学界目前研究斯宾塞，主要关注他的社会学、社会有机体学说及民族国家相关理论。参阅王宪明、姚纯安、黄克武、韩承桦、本杰明·史华兹等学者的研究；彭春凌：《何为进步：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主旨变焦及其投影》，《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② 严复按语，严复译：《天演论》（慎始基斋本），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 1 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109 页。

③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全集》第 3 卷，第 10 页。

④ 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33 页。

⑤ Peter J. Bowler,“Biology and Human Nature”,Peter J.Bowler and John V.Pickston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6 The Modern Biological and Earth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564.

⑥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and Speculative*, Williams and Norgate,1868, Vol.I.p.2.

也可以追溯到1802年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著作，但是，斯宾塞撰于1864年的《生物学原理》（第一卷）却属于第一批，甚或是第一本关于生物学的系统著述。它以其方向性和系统性，“在进化的光亮中给予了生物学一个新的开端”。① 换言之，19世纪以来持续发展的生命科学与进化论在斯宾塞这里实现了重要的绾合。

而在中国，随着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第一次系统介绍近代西方解剖生理学的《全体新论》1851年在广州出版，以及此后德贞《全体通考》、柯为良《全体阐微》等著述的持续推介，“脑为全体之主”② 的观念已逐渐在趋新人士那里产生影响。③ 而《全体新论》相当部分就翻译自威廉·卡彭特的《动物生理学》。④ 另一方面，以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与华蘅芳翻译的英国雷侠儿《地学浅释》在1870年代的梓行为标志，生物进化学家拉马克（译为“勒马克”）、达尔文（译为“兑尔平”）之名已进入中文世界。《地学浅释》最大的贡献并非对进化理论进行阐述归纳，而是通过分析地层的建构，将生物进化的诸种表象，如乳哺类后于禽鸟类，禽鸟类后于蛙蛇类，蛙蛇类后于鱼类等，非常形象直观地传达给读者。中国读者也由此可建立“从古至今，各生物之形，皆由渐而变”的印象，并明了以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来划分史前时代。⑤ 该著在清末影响甚广。雷侠儿即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他的《地质学原理》也正是斯宾塞《论进步》指明的参考书。⑥《地学浅释》就译自从《地质学原理》衍生出来的《地质学纲要》。⑦ 此后，如《格致汇编》所载《混沌说》《地球稽古论》也对生物进化现象有零星介绍。然而，还是要到严复、章太炎正面译介赫胥黎、斯宾塞著作之后，趋新学界才逐渐接受由具有哲学性质的进化论所缀合的一整套对人体生理以及生物历史的新认知。

这就意味着，1850年代斯宾塞已通过进化哲学来整合人体生理学和生物繁衍史，从而建构出一套种群进化和竞争论述。虽然说，他用作材料的相关知识从1850年代开始就以片段化的方式渐次在中国流行，并且相当程度上营造了人们接受其进化学说的知识氛围。然而，直到1890年代后半期，因与那个时代的“保种”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包含斯宾塞种群进化、竞争论述的进化学说才在中国整体登场，并被调律改造以适于国族生存求变的逻辑。这是一条跨度数十年的中英间的知识流通脉络。

二、卡彭特与斯宾塞种群进化论的生成及其在中国的落地

章太炎所译《论进步》的英文原文（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初次刊发于1857年4月。同年10月，斯宾塞发表了《生理学的终极法则》。此文改名为《超验的生理学》，同《论进步》一起，收入了斯氏1858年第一次结集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论进步》与《超验的生理学》构成了事实上的互文关系。《论进步》指出，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化过程中，“同质性的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状态”，就此，“《超验的生理学》

---

① Chris Renwick,“Herbert Spencer, B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Britain”, Mark Francis and Michael W.Taylor, eds.,*Herbert Spencer: Legacies*, Routledge, 2015. pp.115−116.

② 合信：《全体新论》卷3第8，海山仙馆丛书，咸丰辛亥（1851）镌，第1页。

③ 关于晚清西方生理学知识在华的传播，参阅吴义雄：《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④ 参阅松本秀士、坂井建雄：《〈全体新論〉に掲載される解剖図の出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學雜誌》第55卷第4号（2009年），第463−497頁；陈万成：《〈全体新论〉插图来源的再考察——兼说晚清医疗教育的一段中印因缘》，《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⑤ 雷侠儿：《地学浅释》卷13，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光绪丙申（1896）小仓山房校印，第1、4页。

⑥ Herbert Spencer,“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The Westminster Review*, Vol.XI. (January and April. 1857), p.445.

⑦ 聂馥玲、郭世荣：《〈地质学原理〉的演变与〈地学浅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3期。

会有进一步阐述”。[①]《超验的生理学》则指出，《论进步》的立论基础——有机体进化的原因是由于效应的增加，还缺乏直接证据，它恰恰属于超验的生理学，意即“演绎生理学的一个例子”。[②]

严复《天演论·最旨》篇按语所译斯宾塞《生物学原理》第2卷终章的第373段，逐字重复了斯氏1852年发表的《一种人口理论：演绎自动物生育力的一般法则》(以下简称《一种人口理论》)。18世纪末，马尔萨斯指出，在没有妨碍的情况下，人口是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为缓解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速度的生存压力，必须将人口抑制在适当限度之中。英国学者汤姆斯·道布尔戴1842年攻击马尔萨斯的观点，提出“过剩状态总是抑制人口增长，而耗损的状态则总是发展人口数量”，[③]意即丰富的食物反而会导致出生率下降。斯宾塞同意道布尔戴的整体判断，但斯宾塞认为，由于缺少对有机现象特别是不同种族间生育力变化机制的深入研究，在食物过剩抑制人口增长，以及食物匮乏刺激人口增长之间，道布尔戴的理论“没有揭示自我调整的过程”，也就难以单独构成人口规律。斯宾塞借鉴了以卡彭特为代表的一系列比较生理学著作提供的数据，指出，从真菌、橡树、鳕鱼到大象和人，“随着维持个体生命的能力的提高，繁殖能力在降低”。这就意味着“个体化和生殖是对立的”。[④]对于有机生命来说，只有对吸收、血液、排泄和肌肉系统产生协调作用的神经系统，才彰显着个体性的建立。在复杂的器官运作中，生殖系统消耗的能量越多，神经系统占用的能量就越少；反之，神经系统使用的能量愈多，生殖系统所能消耗的能量就愈少。个体性发达的高等动物相较于低等动物来说生殖力普遍更低，这是根本原因。斯宾塞将从观察动物生殖现象得出的推论，导向解释人类各种群的竞争和人类的未来走向。《一种人口理论》这一部分的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了《生物学原理》第2卷末章，也构成了《天演论·最旨》篇的按语。

在中文里，“人口”和“种群”是两个意涵差距较大的词。然而，“population”除了指“人口”外，从生物学角度也指“种群”，表示于特定时空中能自由交配和繁殖的同种生物所有个体之集群。[⑤]种群思维构成近代进化理论的基础。它逐渐接受渐变以及人与自然的连续性，挑战了带有本质主义的类型思维。[⑥]斯宾塞在《一种人口理论》正文中其实更多使用的是“race”这个词，而一般在讨论人口数量的压力时，才用“population”。“一种人口理论”对他而言，毋宁说是一种种群理论。并且，斯宾塞那里的“种群”，不仅指人类整体，还指向体质或文化有差异的各种人类的亚分类，和清末“保种”“合群”观念中的“种群”，在内涵上有相通性。斯宾塞指出，人口增长的压力，是进步非常切近的原因。它迫使种族逐渐扩散，占据地球表面适宜生存的地区，促进农耕和人群的日益社会化。生存的压力刺激人们改善机械技能，发展心智、增强自我约束的道德力量。除了促进儿童教育外，对心智、技能和道德的持续规训，必然导致该种群的神经中枢进一步扩大，同时生育力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那些过度生育陷入谋生困难的家族或种群，如不能通过提高心智活动来增加生产，就必然走向灭绝，并最终被因压力而激励的家族或种族所取代。换言之，人口的压力促进了人类心智的提升和进步，因神经中枢的增长消耗了过剩的生育力，人口压力也最终走向缓解和终结。[⑦]

---

①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and Speculative,*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30.

② Herbert Spencer,“Transcendental Physiology”,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and Speculative,* Longman,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p.279−280.

③ Thomas Doubleday, *The True Law of Population shewn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Food of the People*, Effingham Wilson, 1843, p.20.

④ Herbert Spencer，*A Theory of Population, 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Animal Fertility,* John Chapman, 1852, p.4, pp.11−13.

⑤ 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涂长晟等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⑥ Ernst Mayr, *What Evolution Is*, Phoenix, 2002, p.78.

⑦ 相同的内容请参阅 Herbert Spencer,*A Theory of Population,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Animal Fertility,* John Chapman, 1852, pp.32−34. Herbert Spencer,*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 Vol.II,D.Appleton and Company, 1867.pp.499−500.

从《论进步》与《超验的生理学》，以及《一种人口理论》和《生物学原理》的互文关系中，可知戊戌时期中国所译介的斯宾塞种群进化与竞争论述，事实上成型于19世纪50年代。无论推导进步的法则，还是始于思索马尔萨斯人口论，终于解释人类种群竞争、兴衰和进化，彼时的动物和人体生理学都成为斯宾塞理论建构的关键塔基。鲍勒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达尔文的学说被人们熟悉之前，斯宾塞已经接受了人类社会进步和生物进化思想。“利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种族的排列”，勾勒种族和社会的等级，“这种观点最早的先驱是赫伯特·斯宾塞”。① 卡彭特的生理学与斯宾塞“超验生理学”以及种群进化论之间的间距，能具体体现出“进化”的观念对生物学的渗透。而这一间距，投射到清末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又恰恰是戊戌时期种群进化论的译介，相较于1850年代逐渐引入西方人体生理学之后的一次观念升级。

卡彭特因其一系列通俗性生理学著述的巨大成功，加之曾任伦敦大学教务主任及《大不列颠和外国医学评论》编辑等重要职务，他在1840—1850年代英国医学生的课程和教育上，发挥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的影响力。② 斯宾塞频繁参考卡彭特的作品。相较于“基于观察或经验来推导起因（à posteriori）”的生理学，斯氏倡导可以进行“先验推理”（à priori）的超验生理学。③ 经验的亦或先验的，的确是卡彭特与斯宾塞处理生理学时方法论的差异。

比如，斯宾塞借鉴卡彭特《动物生理学》介绍的荷兰解剖学家坎珀（Petrus Camper）的面角测量法，以脑颅骨相比面颅骨的比例来判断大脑的发育程度。大脑发育程度高，意味着拥有更复杂更异质的神经系统。《论进步》论述人的进步，即人类自诞生以来人体组织变得越来越多样异质时，就根据这一原理，划分了从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的等级序列。最低是有胎盘哺乳动物，其次是低级人种（the lower human races）或曰野蛮人（the savage）、未开化人（the uncivilized man），最高是文明人（the civilized man）或者说欧洲人（the European）。进步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脑的发育程度。④ 相较于卡彭特，斯宾塞更着意于从一些动物生理学的个别现象出发，来推论普遍的法则。例如，卡彭特《比较生理学原理》只说一些啮齿类动物两个侧半的子宫在较低的部位结合，形成人体子宫的雏形。斯宾塞从这里作了一个重要推论，即认为将拥有相似职能的部分统一起来是有机体器官进化的普遍趋势。欧洲人的婴儿就如同成年的野蛮人一样，相较于欧洲成年人，双眼之间和两个鼻孔之间都成比例地分得更开。⑤

《超验生理学》和《论进步》分析欧洲人婴儿和成年野蛮人在双眼距离、鼻孔形状等体质上的相似性，为的是将野蛮种族到文明种群的进化比拟于欧洲人从幼儿到成人的生长。这就支持了“重演（recapitulation）”理论，即认为物种进化的历史被个体有机体的发展所重演。斯宾塞将欧洲人暂时取得的物质文明优势，视作欧洲人种处于人类进化最高位阶的结果，是由大脑发育程度这种本质条件所决定的。他将野蛮的未开化人视同欧洲人的幼儿，就意味着他在所谓野蛮的未开化人与文明欧洲人之间设置了结构性的、不可逾越的时间等级。这体现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思维。斯宾塞引为自豪的“超验”，本质上是人为的推论，也是将某些偏见和臆断合理化的方式。在写作《论进步》的1850年代，斯宾塞坚信欧洲人是人类进化的高级阶段，

---

① Peter J.Bowle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evis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89, p.104. 译文参阅皮特·J·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② 关于卡彭特的生平和研究，参阅 John Lidwell-Durnin,“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 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Hered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020) 53, pp.81−103.

③ Herbert Spencer,“Transcendental Physiology”，*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1858. p.276.

④ 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第173页。

⑤ Herbert Spencer,“Transcendental Physiology”，*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1858.pp.269−271.

在体质、思维、情感能力上都比低级人种优越。斯宾塞晚年虽然反省欧洲的殖民主义，[①]但《论进步》涉及野蛮人与欧洲人差异的文字，在 1891 年大幅度修订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中却未作修改。这至少说明，在人种体质的进化上，晚年斯宾塞并未改变立场。或许他也清楚，没有超验生理学的支撑，他的“进化”哲学将整体坍塌。

卡彭特与斯宾塞不同。一方面，卡彭特是上帝一位论派（Unitarian）牧师家庭的孩子，上帝一位论派的信仰让他坚信人类有统一的起源。尽管他仍旧有偏见地以为非欧洲种族智力低下，但认为那并非天赋使然，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下，他们的心智能力将获得同等提升：“天赋机能是明显存在的，尽管需要开动使其运转起来”。[②]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依据经验和证据说话的生理学家，层出不穷的事实发现和事理分析，让卡彭特很难在人类种群之间划定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更遑论置之于进化的时间序列。卡彭特在 1849—1852 年间撰写了《人的种类》。他比较欣赏詹姆斯·普理查德（James Cowles Pritchard）依据颅骨将人分为三类，一是以几内亚湾黑人为代表的“下巴突出型”，二是以中亚蒙古人和通古斯语族为代表的面平额窄的“金字塔型”，三是以西欧和南欧本地人代表的“椭圆型”。但他又迅急强调，人种间颅骨尺寸没有持续的固定界线，当前的数据太有限。即便根据现有数据，平均颅骨较小的种群中颅骨的最大值，也超过平均颅骨较大的种群中颅骨的最小值，因此，“不可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种群之间划出一条固定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卡彭特认为，人类各种族在生理和心理特征上的差异更多是各自为适应外在生存条件而发生的改变，是程度上而非本性上的差别。他预测，蒙古人或非洲人的后裔“在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下，注定要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占据重要位置”。[③]

卡彭特的生理学和种群论述与斯宾塞“超验生理学”和种群进化论之间的理论差异的核心部分，构成了戊戌时期译介斯氏学说前后，在中国所流行的外来人类种群论述之间的大体区隔。当把在中国呈现为历史阶段性的演变差异返回到斯宾塞相关思想诞生时的英国现场时，种群进化、竞争论述从思想原料加工制作为成品的理论过程，也才会得到清晰的透现。

此前的研究，已相当详备梳理了海通以来中文所译介的西方人种分类学、人体生理学知识与外文原作的关系，这里不赘述。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上重要作品的记录，就足以说明它们和卡彭特生理学和种群论述之间的相似性。即尽管仍有程度不同的欧洲中心主义，歧视非欧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倾向，这些作品描述的种群差异原因，往往是后天文教的有无、多少，而并非在脑的发育上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的、进化的时间鸿沟。

海通之后由外人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撰写的第一部西方地理学著作《新释地理备考》划分天下人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标准在能否识字诵书，建立法制和国家秩序。其中上等者“攻习学问……操练六艺……修道立德，义理以成经典，法度靡不以序，河清海晏之时，则交接邦国，礼义相待。军兴旁午之际，则捍御仇敌，保护身家”。[④] 人分三等，倡导讲信修睦，以礼仪教化之有无作为区分文野的依据，都俨然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易于被中国士人接受。英国医生合信 1851 年出版的《全体新论》，和斯宾塞所利用的卡彭特及其他生理学文献最为相似。末篇《造化论》称：“人之外貌如此不同，致若脏腑功用，众血运行，无少差异。吁！伊谁之力欤？奈何受造蒙恩者而竟未知思也。”[⑤] 造化造人，仅有外貌的差异，人骨、脏腑功用都无不

① 相关讨论，参阅 Mark Francis,*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Acumen Publishing, 2007.pp.192−193,279,286−288.

② 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Animal Physiology*, Wm.S.ORR and Co.,1843，p.542.

③ 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Varieties of Mankind”, Robert B.Todd ed.,*The 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vol.IV.−part II.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49−1852, pp.1320−1365.

④ 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丛书集成新编》第 97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2008 年，第 730 页。

⑤ 合信：《全体新论》卷 10，第 15 页。

同，这正是与卡彭特相似的立场。晚清第一本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在1876年冬和1892年秋分别刊载过《论人类性情与源流》和《人分五类说》两篇文章。前者有对黑人和美洲土人“见识甚浅”“俗无文教”的歧视，但认为人种并非创造文明的关键。[①] 后者则说：“人之为人，总属一类，不能截分，蒙古人未尝无圆额广颡、聪明绝世者，高加索人亦非尽貌扬相美、颖悟超群者；人肯上进，何类非人；人甘暴弃，人亦非人。”[②] 这与卡彭特的理念竟似如出一辙。

在斯宾塞关于种群进化、竞争的著述译介到中国之前或同时，人体生理学，人种学，天体、地质进化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甚至优生学等等这些构成斯氏种群进化学说的“前因”乃至“后果”的诸种学说在中国已有广泛或零星的传播。斯宾塞以“进化”的哲学思维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说组合起来，提炼出一套人口压力促进心智进化、物种进化的历史被个体有机体的发展所“重演”的完整理论叙事。这套理论叙事极大刺激了一个求变时代焦渴的求变欲望。戊戌时期的趋新知识人接受它，却又欲拒还迎。拒的是欧洲人歧视东亚黄种之心，所以章太炎以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来调整《论进步》的种群位阶表述；迎的则是进化的等级划分所带来的种群退化的焦虑感，所以严复翻译《生物学原理》的片段反而强化了种群贵贱的论述。

三、以种分贵贱、黄白同贵调整进化位阶

章太炎1898年与曾广铨合译的《论进境之理》，以种分贵贱的表述置换了原文中文明人或曰欧洲人与低级人种（野蛮人、未开化人）的对峙，包含着将黄白二种同置于“贵种”的意图。其译文曰：“其望而可知足以分别种族者，独在四肢。贱种……上体颇称，而股足顿弛，仅若高等之兽。盖其蜕兽骨以成圆首方趾之形者，他皆易故形矣，惟股足未尽易尔。贵种者，其股足肥硕，与兽绝异。此其大畛也。囟骨之形，贱种则蹙而小，其脑少精，故其知识微。贵种闳而巨，其脑多精，其神经特足，故其知识盛，足以明微妙之理，足以就已知之理而推未知之理。此又其大畛也。虽然，凡人始堕地也，贵贱种皆嫛婗而已，不见其异。及其长也，而日见其不同。股之巨，鼻柱之峻，目之睅，唇之平，颔骨之宽而不削，惟贵种擅之。”斯宾塞原文列出欧洲幼儿与低级人种的若干相似点，包括“鼻翼平坦、鼻梁塌陷，大大地向上方开孔的鼻孔，双唇的形状，额窦的缺乏，双眼间的宽度，双腿短小”。章太炎翻译的方式是反过来指明成人后贵种相较于贱种的外观优势。其中，“鼻柱之峻，目之睅，唇之平”大体可以从斯氏原文中推演出来；但是，“颔骨之宽而不削”这一“惟贵种擅之”的特征，却无法在斯氏原文中寻到痕迹。[③]

“颔”意为下巴，白居易《东南行》即曰“相逢应不识，满颔白髭须”[④]。颔骨宽而不削，大致是下巴宽而不尖、丰腴而不瘦削的面貌；古文更常见的表述是“颐丰”。颐丰，乃是佛教造像融汇汉族特征后的样貌。北宋释道诚《释氏要览》载“宣律师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⑤] 不仅菩萨像，中华古代美女也往往下巴丰腴。清人钮琇的笔记《觚賸》形容，“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⑥] 并且，如卡彭特《人的种类》所归纳的，蒙

① 《格致略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格致汇编》第1卷第12期，1877年，第1–2页。

② 《人分五类说》,《格致汇编》1892年秋季，第10页。孙江指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与《人分五类说》作者很可能都是慕维廉,《人分五类说》并未歧视黄种人。参阅孙江:《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和社会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7–169页。

③ 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第169–175页。

④ 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第325页。

⑤ 释道诚撰，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354页。

⑥ 钮琇:《觚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古人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型最接近颔骨宽而不削。换言之，无论是出自古中国的某种记忆，还是欧洲人的刻板印象，颔骨宽而不削都不是欧洲人的特征。此处的表述，寄予了章太炎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黄种视作贵种的意思。译文如此随性的一笔，就好像种分贵贱的表述一样，都是译者某种内心潜意识的自然流露。

戊戌名刊《时务报》充斥着黄白种争的言论。章太炎谓，“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① 又称，“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吾神皋沃壤，五德晐备，则教莫正焉，种莫贵焉”，② 而与吾族同贵的，则是俄罗斯、英吉利、美利坚等在勇力、筹划、营商方面强于吾族的种群。梁启超则说，“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③ 章太炎曰，“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其贵同，其部族不同”。④ 这提示，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这一看似不经意的表述，乃是戊戌时期以《时务报》为中心，辐射《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昌言报》等趋新舆论界的流行话语，也是斯宾塞种群进化、竞争学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形。不可小觑此一变形的价值，它提供了一个窗口来审视趋新知识人的某种集体心态、知识视野，以及默契背后所隐藏的差异。

传统的华夷观和贵种后裔论，加上民族危机所增长的自我保护意识，产生出以贵贱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表达。明遗民王夫之强调“中国之与夷狄，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⑤ 清末驻外使节薛福成也表示“中国之民，大抵皆神明之胄，最为贵种”。⑥ 戊戌时期知识人的诉说则更能搅动情感的波澜。麦孟华感叹：“中国沃壤二万余里，物产二十六万，地界温带，人尤灵慧。黄人之种，二千年神明之胄，宁瞑瞑以沦胥者哉？”⑦ 唐才常动情宣告，“吾神明之族、衣冠之胄，其智学开明、根柢盘魄，实有以绵亘于天地间者也”。⑧ 佐藤慎一指出，梁启超、章太炎、唐才常等变法派“也承认西方各国是文明国”，变法派“强调的却是西方各国远远比中国文明”。⑨ 戊戌一代如此夸耀中国种族贵美，恰因在心理上处于某种低位。梁启超露骨地说，“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矣；以今日之中国视苗黎瑶僮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红人，巫来由之棕色人，则中国固文明也”；⑩ 他内心恐惧的是，“求免于《春秋》所谓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⑪ 章太炎最忧虑中国人种退化，称“吾不敢道其日益，而道其日损”。⑫ 与此同时，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早就识破帝国主义将污蔑对方人种、文明低劣作为侵略他国的借口：“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縻烂”，目的却是“因众人之所欲，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眴（瞯）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⑬ 为了拆

---

① 章炳麟：《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时务报》第 18 册，1897 年 2 月 22 日，《强学报 · 时务报》第 2 册，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177–1178 页。
② 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 19 册，1897 年 3 月 3 日，《强学报 · 时务报》第 2 册第 1252 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 31 册，1897 年 6 月 30 日，《强学报 · 时务报》第 3 册第 2075 页。
④ 章太炎：《原人》，《章太炎全集 ·〈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0、23 页。
⑤ 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 10 册，岳麓书社，2011 年，第 502 页。
⑥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1892 年 2 月 7 日），蔡少卿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年，第 686 页。
⑦ 麦孟华：《民义自序》，《时务报》第 26 册，1897 年 5 月 12 日，《强学报 · 时务报》第 2 册第 1732 页。
⑧ 唐才常：《各国种类考》，《唐才常集》，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61 页。
⑨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79 页。
⑩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湘报》第 5 号，1898 年 3 月 11 日，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3 页。
⑪ 梁启超：《春秋中国彝狄辨序》，《时务报》第 36 册，1897 年 8 月 18 日，《强学报 · 时务报》第 3 册第 2420 页。
⑫ 章太炎：《原变》，《章太炎全集 ·〈訄书〉初刻本》，第 27 页。
⑬ 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 31 册，1897 年 6 月 30 日，《强学报 · 时务报》第 3 册第 2073 页。

穿和反抗侵略者的阴谋，中国知识人理所当然会宣布自身种族高贵。

除了中国素来的种群观及民族自尊心外，日本崛起后，从东瀛传入的黄种自信，也促成了彼时黄白同贵的舆论导向。开国后的日本弥漫着文明开化意识，黄白种争事实上也蕴含其中。《时务报》“东文报译”类似“星罗万国，不问文野，五洲国民，不论黄白”[①]的表达，正说明社会上普遍存在文野、黄白观念。甲午战后，日本自诩已入文明国，谓“至是天下始知日本之进步，非昔日可比，且许其与诸强国为平等”。[②]他们乐于分享各国人士（特别是白人）对日本人种的赞美，如法国名士说，“贵国之民，与英人种，两美并立，颇为不易”。[③]这样的话日本人爱听，当时的中国人也从中获得自信——梁启超即言，“观日本之浡兴，而知黄种之可用”。[④]

关于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章太炎和梁启超吸取的西学资源及对待种群进化的态度最为接近。章太炎一方面接受了斯宾塞的逻辑，认为脑的发育程度的确能够用来识别种群的贵贱，种群贵贱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漫长的时间中，身体的各种器官会随着使用程度的多少在后代那里逐渐进化或退化，亦即用进废退。另一方面，他后来从反满革命立场来言说“一切以种类为断”，称“民兽”类型的区隔亘古不易，“种性非文，九趠不曰人”，“种性文，虽百挫亦人”。他咒骂戎狄是“肖人形”“能人言”的禽兽，[⑤]哪怕穿着人的衣冠也不过是如虫兽坐在帝王御座上。这些话，既非中国传统以政教礼俗差别划界的华夷观，又和斯宾塞用进废退的进化理念没有半点关系，实乃咒骂当时的异族统治者为禽兽的泄愤之语。这些频繁出现在章太炎政论中的言论，和种群进化论处于不同的频道，有必要分殊一下。

言说颇有些暧昧的是严复，他认为黄种未亡，并非智力能与白人抗衡，“徒以地大人多，灭之不易”。[⑥]当然，严复没有明讲白黄两种已有贵贱之分。但他暗示，一旦被西洋束缚奴役，“民固有其生也不如其死，其存也不如其亡，贵贱苦乐之间异耳”；[⑦]白贵黄贱即便不是已然的状态，也会成为未来的趋向。从真正的宇宙法则出发，严复当然清楚，“天之生物，本无贵贱轩轾之心，故以人意轩轾贵贱之者，其去道固已远矣”。[⑧]然而，在《天演论·最旨》篇按语中，严复仍旧采用了“种分贵贱”的理路框架来翻译斯宾塞《生物学原理》的末章，并且还强化了贵贱种之间在时间层面的等级关系。这样的处理，其实也体现了彼时知识人传播种群进化、竞争论述的某种共同心态，即试图用类似“进化”“退化”等带有自然法则压迫感的言说，来营造一种章太炎所称的“未始不急”、严复所谓的“逼拶”之变革氛围。

四、营造“退化”“灭种”的焦虑意识

在《生物学原理》第 2 卷终章《未来的人类种群》第 374 段开端，斯宾塞对此前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我们现在抵达的命题是，生育力的过剩，通过它一直作用于人类环境上的变化，而使其自身成为人类的进一步进化的原因；并且可以得出的明显推论是，人类由此导致的进一步进化，其自身必然造成生育力的下降。文明的未来进步，一定是由持续不断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将伴随着在结构和功能上，特别是在神经的结构和功能上提升的个性化的成本。在愈加拥

① 《列国去年情形》,《时务报》第 19 册，1897 年 3 月 3 日,《强学报·时务报》第 2 册第 1289 页。
② 《太平洋电线论》,《时务报》第 7 册，1896 年 10 月 7 日,《强学报·时务报》第 1 册第 459 页。
③ 《法名士上日本某将军书》,《时务报》第 32 册，1897 年 7 月 10 日,《强学报·时务报》第 3 册第 2186 页。
④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第 33 册，1897 年 7 月 20 日,《强学报·时务报》第 3 册第 2215 页。
⑤ 章太炎:《原人》,《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 21–23 页。
⑥ 严复:《保种余义》(1898 年),《严复全集》第 7 卷，第 84 页。
⑦ 严复:《原强》(1895 年),《严复全集》第 7 卷，第 20 页。
⑧ 严复按语，严复译:《天演论》(慎始基斋本),《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18 页。

挤和复杂的社会中平和的生存竞争，一定伴随着在质量、复杂性和活动性上了不起的中枢神经。在社会生活愈发增强的竞争中要保留位置和抚养家庭的人，作为其精神源泉所需的更大的情感载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定关联着更大的大脑。在一个更好的社会，能使个体留下持续后代的、以更好的自律性为前提的那些高级情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关联着一个更复杂的大脑。随着社会的发展，成功生活越来越必需的更众多、更多样、更普遍和更抽象的观念，也同样如此（关联着更复杂的大脑）。”[①]《天演论·最旨》篇按语将此段译为：

> 吾是书前篇，于生理进则种贵，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覆辨证之矣。盖种贵则其取精也，所以为当躬之用者日奢，以为嗣育之用者日啬。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群治进，民脑形愈大，襞积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种之能力，与脑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穷理，自治治人，与夫保种（詒）〔诒〕谋之事，则与脑中襞积繁简为比例。[②]

严复译文分别两次出现牵涉戊戌时期种群竞争论述的关键语汇“种贵”和“保种”。揆诸斯宾塞原文，译文第一次“种贵”对应的是“man’s further evolution”（人类的进一步进化），第二次“种贵”对应的则是“that futur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未来进步）。也就是说，斯氏原文中一般性描述人类进化过程动态的话语，在严复这里变为指涉人类某一特定种群的属性。至于两次“保种”，如完全核对原文，第一次“自存保种”的“保种”，尚可视为对译“抚养家庭”（rear their families），以与“自存”——在竞争中“保留位置”（hold their places）并列。而第二次“保种诒谋”的“保种”，则不能完全视作对“使个体留下持续后代”（enable the individual to leave a persistent posterity）的翻译。因为，“诒谋”才更吻合这一含义。诒谋，即是“诒燕”，典出《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诒谋、诒燕，指为子孙妥善筹谋使其安乐。这意味着，“诒谋”之前的“保种”指向家庭之外的种群区隔。放到时代语境中，这两次“保种”和严复《天演论》《保种余义》等同时期文章中反复言说的“保种”意义相当，投射的是他在黄白异种之争氛围中的国族诉求。

偏向于民族国家视野，是严复翻译和解析斯宾塞学说的突出特征。他警告，如耽于生育而不是在人口与资源的生存竞争中提升心智和自律性，从而促进脑的发育，整个种族将面临退化乃至灭亡的危机。灭种，是时代危机中潜伏的最深层次恐惧。严复的翻译，强化了关于灭种的危机感和恐惧感。

《最旨》篇按语翻译斯宾塞《生物学原理》终章描述人类生存或灭亡大势的段落，称：“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不远矣。”[③]“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原文中找不到对应，是严复自己添加的内容。这说明，所谓的进化、退化、灭种，其最具实感的体验是由地质学带来的。《地学浅释》早就说，“每一种生物，其种类之绵延，其期各有长短，惟从未遇有已绝灭之种类而更生于他层者”。[④]地层纵深，表现的正是进化层级的不可逆，而生物的灭绝是一个绝对的不可逆事件。地质学揭示的骇人事实，建构了清末知识人对于种类“贵贱”不同命运走向的想象图景。严复的翻译正是借助这种观念氛围来加速人们的紧迫感——一旦灭种，就好像九地之下的那些古兽残骨一样，没有重生的可能。

斯宾塞进化学说带有高度的哲理意味，他试图揭示宇宙、物种漫长演变的自然历史与人类

---

①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 Vol. II,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67. pp.501–502.

② 严复按语，严复译：《天演论》（慎始基斋本），《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10 页。

③ 严复按语，严复译：《天演论》（慎始基斋本），《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10 页。原文参阅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 Vol. II,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67. pp.499–500.

④ 雷侠儿：《地学浅释》第 9 卷，第 1 页。

社会万千年变迁脉络的一般性法则。在描绘人类种群的进化变迁时，尽管熏染了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其所勾勒的演变图景仍旧指涉着超长时段的人类文明进程。戊戌时期对斯宾塞种群进化学说的译介，无论是灌注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的意识，还是加剧保种或者灭亡的焦虑感，这些调整都是为了因应并且进一步激发中国社会迫切的变革诉求。最为吊诡的是，作为始作俑者，引介斯宾塞学说的诸位译者其实内心十分清楚斯氏进化学说的“本相”与他们传达出来的样貌之间的差异。他们甚至还屡屡做自我剖析，为何要如此肆意而为。

章太炎在《斯宾塞尔文集》的翻译终止后谓“鄙意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者，虽清眇阔疏，如谈坚白，然能使圆颅方趾，知吾身之所以贵，盖亦未始不急也”。[①]《四惑论》中，他又说，“进化者，本严饰地球之事，于人道初无与尔”。[②]章太炎以为，儒家的主流文化不讲鬼神和灵魂；贪生怕死，令激发社会民气的手段有限。然而，儒家“胤嗣之念”“福利后裔”的意识又明显强于他种文明，“今知不致死以御侮，则后世将返为蛮獠猩狒，其足以倡勇敢也明矣”。通过经营“退化”“灭种”的焦虑意识，可以达到“作民气”的目的。[③]严复也清楚，生物的进化动辄经历逾亿年的时间，人类也已经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以数千年数百年为区间，体质进化的痕迹微茫到几乎看不见。法国的生理学家查验埃及数千年骨董，就“觉古今人物，无异可指，造化模范物形，极渐至微”。[④]

这样的认识，一方面让脑含量或神经中枢差异与人种贵贱的关系骤然间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无论究竟有没有优劣之分，“众生根器”“樊然不齐”，[⑤]在可见的现在和不可见的未来，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人力所不能及、无可为。人力真正能有所为的，只是“政教、学术、农工、商战”等文明的外形。因此，戊戌时期认知到头颅角度含义的章太炎、严复等后续其实很少讨论脑结构方面的问题，而是回到提倡“心力”，发挥主动性来改造世界这等人力所能及的层面。另一方面，“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⑥]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一切物种都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并且通常来说，变化发生的快慢和“逼拶”的急缓成正比。散播退化灭种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因此成为热烈盼望中国发生速变的知识人的某种本能反应。他们既被时代风潮裹挟着往前走，又推动着时代往前走。正是在强调快速适应转变的环境，使自身发生积极改变的层面上，斯宾塞所继承的拉马克主义用进废退的理念，才受到他们热切的接纳。[⑦]

五、结语

随着庚子后民族危机的加剧，黄白种争的论述在舆论界进一步推扩、深入，描述种群竞争、进化的相关术语已逐渐成为人们口头禅式的习惯用语。《革命军》专辟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其中曰：“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交战于天演界中，为亘古角力较智之大市场，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⑧]《湖北学生界》则有文章哭诉灭种悲情以进行革命动员：“种族之将灭，四百兆黄帝之子孙将为奴隶、为牛马，供卷发皙颜高颧隆准碧眼黄髯儿之蹂躏蹴

---

① 章炳麟：《答梁卓如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 年 2 月 5 日，汉文第 5 版。

②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21 页。

③ 章炳麟：《答梁卓如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 年 2 月 5 日，汉文第 5 版。

④ 严复按语，《天演论》（慎始基斋本），《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12–113 页。

⑤ 唐才常：《各国种类考 · 强种说（附）》，《唐才常集》，第 211 页。

⑥ 严复按语，《天演论》（慎始基斋本），《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13 页。

⑦ 彭春凌：《斯宾塞用进废退理念与清末多重翻译渠道的种群竞争论述——以严复、章太炎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 期。

⑧ 邹容：《革命军》（1903 年），严昌洪、何广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 杨毓麟 陈天华 邹容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38 页。

踏”。[①]《云南》杂志忧虑“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中西人种之性质之行为，判然若云泥，彼以适于今日而占优胜，我以不适于今日而归劣败故耳”。[②] 从清末到民初，在塑造国民精神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学制和教科书，同样引入了黄白种争的论述。如 1904 年的《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地理课要知晓“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③] 而中华书局 1913 年《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介绍“欧罗巴种最强，差足颉颃者，惟我亚细亚种……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④]

在这样的时代舆论氛围中，胡适 1915 年批评“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⑤] 物竞、天择、竞存、优胜劣败、淘汰等词，泛滥于舆论界，构成普通国人对进化论浅尝辄止的乃至庸俗化的认知。这确实是流露在清末喧嚷的舆论表层之显在现象。然而，本文研讨了斯宾塞种群进化、竞争论述在中国译介、落地、转化的过程，发现了更深层的面相。自 1850 年代以来，人体生理学、地质学这些涉及生物历史的新认知已经逐渐被引入中国；卡彭特、赖尔的作品，也正构成了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的知识原料。斯宾塞以超验生理学所代表的哲学的进化观念来缀合此前流行的生物学知识；而严复、章太炎戊戌时期译介了斯宾塞主要成型于 1850 年代的种群进化、竞争论述，事实上意味着在中国发生了相似的缀合过程。章太炎、严复以时人习惯的思考方式，因应国族诉求，将斯宾塞描述生物漫长变迁过程的种群进化论述调整为种分贵贱、黄白同为贵种。他们抵制欧洲人歧视东亚黄种之心，又强调进化的贵贱等级来增加种群退化乃至灭绝的焦虑感和压迫感，从而为政治变革营造社会气氛。

References

Bowler, Peter J. “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eds. Peter J. Bowler and John V. Pickston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6 The Modern Biological and Earth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owler, Peter J.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evised edi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89.

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Varieties of Mankind”. in *The 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vol. IV.–part II. ed. Robert B. Todd.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49–1852.

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Animal Physiology*, London: Wm. S. ORR and Co., 1843.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ubleday, Thomas. *The True Law of Population shewn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Food of the People*.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43.

Francis, Mark.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Stocksfield: Acumen Publishing, 2007.

Gezhi huibian(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Vol.I. No.12.1877. & Vol.VII. No.3.1892.

Hobson, Benjamin. *Quanti xinlun*(Anatomy and Physiology). Guangzhou: Haishanxianguan, 1851.

Lidwell-Durnin, John. “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 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Heredity”,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53, 2020.

Lyell, Charles. *Dixue qianshi*(Elements of Geology). Translated by Daniel Macgowan, Hua Hengfang. Nanjing: Xiaocangshanfang, 1896.

Marques, José Martinho. *Xinshi dili beikao quanshu*(A new reference book of Geography).Taipei: Xinwenfeng

①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 2 期，1903 年 2 月 27 日，“论说”栏，第 1 页。

② 《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 1 号，1906 年 10 月 15 日，第 3–4 页。

③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319 页。

④ 史礼绶编:《新制中华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7)，中华书局，1913 年 4 月初版，第 4–5 页。

⑤ 胡适:《东西人士迎拒新思想之不同》(1915 年 5 月 8 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 2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28 页。

chubangongsi, 2008.

Matsumoto Hideshi, Sakai Tatsuo. "On the Sources of the Anatomical Illustrations Appearing in Quanti−xinlun". in *Journal of Japanese Medical History*. Vol.55. No.4. 2009.

Mayr, Ernst. *Shengwuxue sixiang fazhan de lishi*(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Translated by Tu Changsheng. Chengdu: Sichuan jiaoyu chubanshe, 2010.

Peng Chunling. *Zhang Taiyan yi Sibinsai'er wenji yanjiu chongyi ji jiaozhu* (A study, re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Spencer's Essays translated by Zhang Taiya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21.

Renwick, Chris. "Herbert Spencer, B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Britain". in *Herbert Spencer: Legacies* eds. Mark Francis and Michael W. Tayl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Shiwu bao(The Chinese Progress)(1896−1898). Reprinted by Zhonghua Shuju, 1991.

Spencer, Herbert. *A Theory of Population, 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Animal Fertility,* London: John Chapman, 1852.

Spencer, Herbert.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Spencer, 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 Vol. II,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67.

Sun Jiang. *Chongshen zhongguode jindai: zai sixiang yu shehui zhijian*(Rethinking "Modernity" in China: between thoughts and society). Beijing: Shekewenxian chubanshe, 2018.

Yan Fu. *Yanfu Quanji*(Complete works of Yanfu). eds. Wang Zhenglu, Fang Baochuan and Mayong.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2014.

Zhang Taiyan. *Zhang Taiyan quanji*(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Shanghai: Shanghairenmin chubanshe,2014−2017.

Adjustments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Discourses of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mong the Race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PENG Chunling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ngcl@cass.org.cn)

Abstract: Herbert Spencer's evolutionary theories constituted the main external resources for the discourses on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etween races during late-Qing period. To refute Thomas Robert Malthus's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Herbert Spencer combined his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with the knowledge of animal physiology and biological history represented by William Carpenter and Charles Lyell. Most of the physiological works and racial knowledge influenced by William Carpenter had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and disseminated in China since 1850s. Translations of Herbert Spencer's works on animal physiology and biological history had a similar impact on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Resis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toward the "Eastern Asian yellow race",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constructed the population's evolutionary order from Herbert Spencer with a discourse of equal dignity for yellow and white races. Meanwhi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ctively created a social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political revolution by intensifying the hierarchy of race, building anxious consciousness of retrogradation or extinction, and warning of reforming national mentality and self-discipline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for existence.

Keywords: Herbert Spencer, William Carpenter, Yan Fu, Zhang Taiyan,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population